

「楓窗隨筆」序言

■陳蘭蓀

「楓窗隨筆」為民33級學長陳蘭蓀之散文集，「友聲」將自327期起摘錄菁華部份刊登，以享好友。

我是個學了工程，然後當了一世工程師的人。大凡從工的人，所受的訓練是屬於邏輯思維的；而從事文藝寫作是傾向於形象思維，這兩種思維習慣往往互相排斥，我的母校交通大學有百年歷史，在工程界人才輩出，就沒有出現過像謝冰心、朱自清這樣的文人，現在我以投暮之年，忍而擔於文事起來，不管寫出來的東西登不登樣，總是有些反常。這反常現象，歸因於兩個人：

一位是先父曝南公、他老人家是科舉廢除後受現代大學教育的人。對中國的古代經典，有後期大學生所欠缺的根基；但卻擺脫了前期老秀才所受的桎梏。老人家淡泊豁達，最喜歡的享受是公餘駕上幾杯，我是他的獨子。他兩杯下肚，興緻上來，就叫我拿一本書，和他在檯角坐下，讓我在他杯裡啜一口兩口，隨意翻到那頁，就歡暢淋漓地講解起來。他有一套特殊的朗吟調子，講完就叫我跟他拉起調門唱，盡興而止。

他教我的東西大多是「古文觀止」「唐詩三百首」上的；間中必搭點論語，孟子，左傳，史記，以至詩經，九歌，離騷等比較艱澀的經典。他這樣做純粹是助興，「好白相」。不要我背誦，也不再盤問我。但在春風化雨的滋潤下，讓我在不知不覺中積累了許多詞彙，學會了許多用字遣詞的法門，體會了文章的結構，氣勢和

聲調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他卻盡力教我不要受「之乎者也」之類死亡言語的影響。從我能記憶得起，他就不要我在信上寫「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」而代以「爹爹」兩字。至今我筆下還算通順，首先不得不歸功我的慈父。

另一位是我在交通大學貴州分校時的同學唐慧貞女士。我和她在一九四零年代先後離校，其後的三十年，一直失了聯繫。十年前，從我長婿張天鴻的線索把我從Texas這冷角落落裡找了出來。那時，她正擔當交大校友的期刊「交大友聲」的總編輯。一恢復了音訊，他就督責我寫稿。老朋友情面難卻，我就勉為其難地學起搖筆桿來。我生平第一篇用鉛字印的文章，是在一九七八年七月號的「交大友聲」登出來的。當時的擔心、害怕、興奮、得意、猶為票友第一次登台綵排。寫了幾篇之後，膽子才漸漸大了，想想與其寫不相干的題目，何不寫點抗戰時內地大學生的生活花絮，倒或許喚起這時期的同學們塵埋已久的記憶。卻想不到登了出來，大受平越時期校友的歡迎。好多失散了幾十年的同窗老友紛紛來信，藉以恢復了音訊。令我動筆的興趣和信心都提了起來。

我一生中從私人書札到近十年公開發表的文字，如果我存心要刻意求工的話，筆底下就枯澀不堪。即使勉強成篇，總越看越不像樣。如果一件事、一個情景、一

種念頭、在心中躍躍欲出，恐怕筆尖迫慢了讓其中的細節跑掉，不得不伏案疾書，吃飯睡覺都得挪後一下。這種情況下寫出來的東西，往往就比較還過得去。從這種體驗，讓我悟出兩個為文的道理來：一是言之有物，講自己熟悉的事，講自己瞭解的事，不無病呻吟，不好高騖遠。二是質樸不華，老老實實地寫不用心雕鑿，不裝腔作勢。

我們這一代大致上與二十世紀共始終的人，從獨輪車坐到飛機，從鹹菜大麥飯到乳酪牛排，從搖酸手叫破喉嚨的電話到看衛星傳來的現場新聞，從竹牆茅簷住到氣溫調節的屋子，其間經過內亂，外患、逃過難、挨過炸彈、做過黃魚、當過兵、受過飢寒、歷過艱險、變化之大，花樣之多，幾乎每個人都有幾樁傳奇故事。現在

一生將盡，回想起來，是生而不幸，還是生面有幸，或兩者兼而有之？如形諸筆墨，素材的豐富，做到言之有物，絕無問題。但是六十歲學打拳，單憑豐富的素材，未必經得起諸位看官的法眼，只好盡可能地在平易中藏拙，避免貽笑大方。

我所住的地方，十年前還是棉田，十年中發展成一個新的住宅區。書檯對著窗外，有一棵楓樹，種下的年份不多，至今只有飯碗口粗細。對著這棵未成熟的幼楓，寫我不成熟的文章。將近七十的人，既等不到幼楓成老幹濃蔭，也寫不到文章卓成一家，因而將文集名為「楓窗隨筆」聊以自嘲，是為序。

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，Lubbock, Texas, U. S. A.

